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丛书

治校
治教
治学

——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

主编/张留芳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德厚生
篤學敏行
爵得菜根
做尋大事成

止于至善
厚學
敏行
爵得菜根
做尋大事成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丛书

治校

治教

治学

——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

主编 张留芳

副主编 高谦民 李学农 夏里原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校·治教·治学——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张留芳主编.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81047-954-7/G·612

I. 治... II. 张... III.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史料 IV. G659.2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068 号

书 名 治校·治教·治学——南京师范大学办学理念寻踪
主 编 张留芳
责任编辑 戴联荣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3598077(传真) 3598412(营销部) 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nuniprs@public1.ptt.js.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58.25
字 数 1146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200 册
书 号 7-81047-954-7/G·612
定 价 99.00 元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宋永忠

副主任：笄佐领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景仑	王 恺	申忠宇	叶惟寅	有德乡
沙 润	刘炳升	宋永忠	李 邨	吴康宁
汪 忠	陈松涛	张 明	郁炳隆	范 扬
金邦荃	居 荣	赵仁康	侯小刚	施和金
施国新	顾渊彦	钱焕琦	郭常义	徐沛林
夏锦文	笄佐领	谢世诚	潘百齐	

引 论

张留芳

(一)

这本书把文章做在“办学理念”上。“理念”这个词,近些年的使用频率相当高。系之于教育,便有“教育理念”;系之于大学,便有“大学理念”;系之于办学实践,便有“办学理念”;如此罗列起来,可以想见,它的适用范围之广。

“理念”的内涵是什么?很多人在探索,自然就产生了很多种说法。我们知道,理念,首先是从西方产生和传播开来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理念这一问题的,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后来柏拉图对理念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和阐述,形成了他的“理念论”。以后康德、黑格尔对理念问题也都有专门的论述。在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理念,指理性领域内的概念,所谓“纯粹理性的概念”。有学者在研究之后认为,无论是先哲还是现代的人们,对“理念”一词的理解和运用,通常是等同于“观念”,或与“观念”、“思想”互换使用的。他指出:

理念是观念,是思想,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观念和思想,它更多地表现为那种“纯粹理性的概念”的观念和思想,所以更具有理性色彩,因而更加深刻。……概而言之,理念是主观(观念认识)对客观(存在、规律)的反映。科学的理念能够客观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起到正确的指向和导向作用。

另有学者说得更详细一点:

“理念”是个具有能反映一类事物每个个体或一类现象每种个别现象共性之能力的普遍概念,具体说它是诸理性认识及其成果的集大成。它既包含了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论、理性、理想、理智,又涵盖了上述思维产品的表现物,为目的、目标、宗旨、原则、规范、追求等,而后者使理念这一抽象的概念具有了直观的形象。这一认识似乎比较笼统地把“理念”视为一种至真至善的精神境界、精神力量或抽象的思维活动,更全面、更能真实地反映和再现“理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样一种界定也较好地解释了当今社会人们

何以如此广泛地运用“理念”这一概念的原因。

我们大体上同意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理念是反映对象深层次本质和规律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本质性、丰富性、前瞻性、体验性、导向性、继承性、创新性、共享性等诸多特点；它既能表现为观念的“单个”存在，也可以是有内在联系甚至有严格的逻辑关系的“观念群”，可以是一个“理念系统”。“理念”作为“应然”范畴的观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重要性：“所谓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基本问题的深层次本质和规律的观念。教育理念是教育的灵魂和根本性指导思想，对教育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的教育理念，是一种“远见卓识”，它能正确地反映教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科学地指明教育前进的方向。人们发现，作为教育理念的办学理念，在大学尤其在现代大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自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以来，大学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大学理念的演变史。”“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大学理念一直或显或隐地影响和导引着大学发展的实践。大学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追求理想、践行理念的过程。”“当人们审视现代高等教育新出现的种种问题甚至是危机时，发现其主要根源之一在于理念的危机。”台湾的一位大学校长甚至提出了“理念治校”的主张。他从价值观的角度理解“理念”：“所谓‘理念’，乃是共同分享的价值观，有理念即有方向感，即有目标性，有理念方有准绳，方为标杆。所谓‘理念’，乃组织之最高领导原则……一个无理念的组织，犹如无舵之舟，无弦之弓，何之治？”

我们也正是认识到办学理念在办学实践和治理学校中的重要性，才着手从“办学理念”这一角度回望百年来的办学历程，希冀从中总结到某些经验，启发出某种思考，使我们的办学理念更科学、更有效、更富前瞻性、更合规律性。

与“理念”内涵的丰富性一样，“办学理念”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办学理念”中的“办学”，是“创办”、“开办”之意，又有“办理”、“治理”、“管理”的意思。“学”是“办”的对象，我们这里指的是大学。“办学理念”，就是创办大学、开办大学、管理大学、治理大学的理念。理念或隐或显，跻身于多种表现物之中。为了保持百年来先哲先贤们办学理念的真实面貌，我们收罗剔抉，把百余年历史的痕迹奉诸读者之前。又不揣鄙陋，在“资料汇编”之前写下若干篇“述论”，意在有所提示。但是由于编写者的认识和水平有限，恐怕难以如读者之意，或许还有诸多错误。因此，诸篇“述论”，连同这篇“引论”，也许只能供抛砖引玉之用吧！

(二)

既然是“寻踪”，就不能不回望南京师范大学的整部办学史。2002年，我们已经隆重地庆祝过学校的100年华诞。这100年，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惊心动魄的年代。一部办学史，自然伴随着风雨雷电，充满了悲欢离合。可是，钟山巍巍，大江涛涛，这虎踞

龙盘地毕竟成就了多少学界巨子,教坛俊彦!他们开创了100年的传统,留下了100年的功业,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赐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京师范大学得名于1984年,是由南京师范学院易名改办而成。南京师范学院成立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但它的办学渊源,可以追溯到1902年开始谋划的由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燾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之一。1906年5月,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学堂星散停办,至1914年8月30日,民国政府批准改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8月11日,南高师经过整理、修葺,才正式招生。1920年12月得到政府教育部批准,南高师成立添设大学的筹备机构,在师范本科仍需保留的前提下,各专修科改办为东南大学。此后进入两校一体的发展阶段,至1922年12月6日,出台《南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1923年7月3日,出台“南高行政会议议决取消高师案”,从此撤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名,正式并入由它的专修科为基础成立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设文理科、教育科、农科、工科、商科,当时的“科”相当于后来成立的学院。师范教育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东南大学的事业发展达于顶峰。此后由于“易长风潮”和政局变化,东南大学开始衰落。1927年3月中旬,由于战争爆发、政局动荡,东南大学被迫停课,师生四散。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派员接管东南大学。6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各省区设立一所大学,并统管全省教育。同日明令将江苏境内本科以上的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四中初设9个学院,即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文学院、哲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后改为江苏大学,遭到师生抵制。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复议了大学委员会的提议,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南京解放后,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改名“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经政务院核定,校名取消公立字样,迳称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学院的另一主要渊源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两所私立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88年的汇文书院。至1910年,美国教会合并汇文、宏育两座书院建成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金陵大学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于1913年。后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新中国成立,这两所学校获得新生。1951年,断绝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后,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公立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以南京大学为校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根据政务院关于加强师资培养的要求,决定成立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由陈鹤琴为主任委员、吴贻芳等为副主任委

员,委员有:齐建秋、高觉敷、张士一、熊子容、钱且华、黄显之、陈洪、戴安邦、高济宇等。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金陵大学教育系、儿童福利系为基础,在原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上,挂起了南京师范学院的校牌。近50年来,学校经历过几次合并。如南京师院时期江苏教育学院、江苏新闻专科学校的并入;南京师大时期,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的并入。至2000年,学校已经有了随园、仙林、紫金三个校区,校区总面积已达3100亩,学生当量数已达3万人。从1902年算起,我校的历史正好由两个50年构成。1902至1952是前50年,为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或渊源时期;1952年以来的50年,是独立办学和独立发展时期。

(三)

在办学理念系统中,至关重要的是办学主体对于对象的认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学理念”,亦即关于大学的性质的功能、地位、作用、使命、责任、特征等“应然”范围的认识、理解和体验等。

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者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是晚清政府官员中有思想的人物。刘坤一、魏光焘亲自指挥并参与中日甲午海战。他们都力图挽救清朝的颓势,振兴中华民族,他们力主兴办新学,是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办学,是要遵循规律的。在张之洞看来,此事“体大思精,其中等级繁多,而次第秩然,不可紊越,必须扼要探源,方有下手之处。”他强调说:“查各国中小学堂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是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惟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可见,强调办师范学堂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各学校培养师资。这种师范学堂,不同于传统的学校,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制度,礼聘中外良师,“研究教育之理,讲求教授之法及管理之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目标,他们是要创办一所中国新型的、吸取国际办学经验的、培养目标明确的高等师范学校。

三江师范学堂开办后,校史上历任校领导中杰出人物如李瑞清、江谦、郭秉文、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乃至建国后仍任院长的陈鹤琴,以及“文革”结束以后的几任校领导,在“大学理念”方面,都有各自的建树。

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学堂六年,他的一句名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办学理念:“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他考察分析了日本崛起、欧美强盛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教育。“由此观之,有教育若此,无教育若彼,强弱之原,存亡之机,诃不重耶?”他把张之洞的办学理想变成了现实。他锐意革新,悉心治校,将一个草创不久的师范学堂,治理成一所较具现代性的高等师范学校。日本人松本孝次郎在《南清教育情况》中说,这所学校已成为“江苏的最高学府,南方各省师范学堂的模范”,“堪与北方各省同类学堂较量”。李瑞清对两江师范学堂功不可没。

先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后任校长的郭秉文,1908年赴美国留学,取得理学士、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留美学生中最早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曾任旅美留学生会会长。他的博士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著名教育家孟禄作序。由周盘译述、黄炎培作序的中文译本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上起远古,下迄1913年,“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1923年起郭秉文连续3届当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可见,他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

郭秉文主持南高师、东大办学10年。有人说:“从南高的成立和发展,到东大的创建和崛起,始终都处于学校核心位置者,只有郭秉文一人。”的确如此。郭秉文的办学理念,有一个体系。他的大学理想,是现代化的体现人文与科学两个方面先进性的综合性大学。他主张“寓师范于大学之中”。这种理念无疑是受到美国学者的影响。南高刚刚办出声誉,他就以专修科为基础,办起了东南大学,两校一长,协同发展,在“高师改大”的浪潮里,最终由东大取代了南高师。现在看来,当时“高师改大”的思潮,从师范发展史的角度看,有些超越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因此作为全国的教育政策,未必是精彩之笔。但从一个学校看,这种发展则有其必然性、规律性,是许多师范学院发展的归宿。在美国尤其如此。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之前是纽约州立师范大学,再之前是纽约州立师范学院,再之前是纽约州立师范学校。郭秉文把南高向东大转型这篇文章做得相当漂亮,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郭秉文作为教育家、哲学家,他对中国哲学的精华深得要领。他的治校理念的关键是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办新式的高水平的大学,到处都需要创新,但创新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平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旦失衡,事业就可能颠覆。郭秉文认为,就大学教育而言,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一是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应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设立多种学科,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创造条件“使通才不致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使之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出于这一理念,大学的学科就应多一些,综合化程度高一些,从这里也可以找到“寓师范于大学之中”的出处。郭秉文的看法与蔡元培不一样,蔡元培主张大学要集中有“学”理的学科,应用性的学科不应设在大学之中。反映了两人大学理念的差异。与北京大学相比,当时的东南大学有文理、教育、工、农、商诸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二是人文与科学平衡。一所综合大学,既要体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又要体现人文观念与科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三是师资与设备平衡。大学教育必须以教师为第一,但是现代大学的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四是国内与国际平衡。大学要成为向国际开放的窗口,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心。

郭秉文的办学理念,得到学校同仁的理解和支持,也争取到教育部长范源源的支

持。仅仅10年时间,南高师、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东南大学作为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并峙,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中央大学时期,有一个非同一般的校长,他就是罗家伦。1913年10月11日罗家伦的就职演说题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的10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认为国立大学,应对民族与国家尽到特殊的使命和职责。将大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罗家伦大学教育理想的精髓。他说:“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起创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

解放以后,南京师范学院定位在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层面上。党和政府规定学校的任务是为江苏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建院之初,陈鹤琴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师院校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他怀着“大力培养人民教师,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文化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承担起创建社会主义高等师范院校的艰巨任务;学习苏联经验,对旧有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全面改造;广泛延揽人才,团结一批著名教授、学者,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为南京师院的发展搭建了学术平台;扩建校园,增设学科专业,扩大办学规模,使南京师院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居于前列地位。20世纪六十年代,在教育思潮越来越“左”的情况下,华诚一重视遵循教育规律办校,对学校的发展仍有不少建树。“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宫维桢、杨巩、吴诃等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学校领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自我发展的条件得到改善。南京师范学院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这一盛事激发了办学者的勃勃雄心。冯世昌、归鸿、谈凤梁等提出了创国内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谈凤梁已经意识到,师范大学必须扩大学科支撑,必须扩大服务范围,必须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才能取得发展的条件。在计划经济的约束力还十分强大的时候,他提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发展策略。王臻中抓住了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契机,以“进不了‘211’,我引咎辞职”的决心,带领全校向新的目标冲刺。这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新型一流师范大学”。这种新型高师,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体现出学科的高水平、多元化特点,冲破了传统高师院校藩篱的新的大学。公丕祥则充分利用我校进入了“211工程”的大好时机,有效地调动各种教育资源,完成了打造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并且适时地把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的教学科研型大学”的目标写上奋斗的旗帜。可见这20年来校领导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理想,虎虎而有生气。可以预期,我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辉煌,完全可能新的世纪里再度呈现。

(四)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理念,是大学办学理念的重要内容。

李瑞清希望两江师范学堂的青年学生要做“中国之培根、笛卡儿”,成为国家可依赖的杰出人才。他强调人文熏陶,注重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喜欢主张“言论自由、学习独立”的学生。“视学生若子弟”,充满爱心。这种爱心甚至超越了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因而他受到学生的尊重和爱戴。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不仅建校创业,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同时,要培养“做得大事”的学生,也必须使他们有“嚼得菜根”的精神。

郭秉文主持南高、东大十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实行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原则,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已从一味模仿日本转而学习欧美。三育的标准是,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养成坚强的体魄和充实的精神。训育在中国由南高首创,训育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以强调“启发”和“实践”,让学生“自动”。

南高的校训只用一个字:“诚”;南高的气度概括起来也只一个字:“大”。首任校长江谦在1916年前后写的校歌歌词: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兮万方兮,一趋兮同。
钟海西上兮,江东;
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曦。

唱起这样大气磅礴的校歌,一种气势,一种自豪,一种自信会油然而起。以“诚”为训,以“大”为怀,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形成了南高师独特的校风,表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以及诚朴、勤奋、求实的学风。

罗家伦的大学理念中,使命感、责任感很强。他认为“青年是国家的基础”,必须接受“完备的教育”,成为“完人”。培养作为国家基础的“完人”,便是他的人才培养理想。因此,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共进,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学生的“体格”和“人格”问题。他强调学生注意“人格修养”,成为“堂堂正正的知识公民,一方面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另一方面是继往开来的中坚。”可见罗家伦秉承了当年南高的“大”气,对学生的期望值

很高。他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罗家伦把从南高、东大发展而来的诚、朴的学风扩充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并且亲自写成了校歌：

国学堂堂、多士踰跲；
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
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识为先，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与大气磅礴的南高校歌相比，“大”字以外，更加一“沉”字：重任在肩，举世属望。民族危亡之际，罗家伦所希望于学生的，多一份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建国以后，南京师范学院以培养中学师资为己任，人才培养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倡导教书育人。冯世昌、归鸿领导时期将校风概括为“严谨、朴实、奋发、奉献”八个字，明显可以看出与前身的传统承继关系。2002年，南师大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新校训，强调人伦道德、人本关怀，要求笃实于学，敏捷于行。从校训也可以看出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百年历史，我校在人才培养理念上，一直强调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强调知行统一，强调精神和气度，强调责任与使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三个核心概念是：针对性、质量和效率。所谓“针对性”，又称“适应性”，是大学对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适应与反映，也就是要针对社会现实变化的要求，调整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

质量，主要指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的理想，必须通过人才质量来确证。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始终超不出那句古训：“名师出高徒”。这条屡试不爽的铁律，不能不在办学者的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位学者概括大学老师的“基础性作用”为如下四点：一、大学办学的主体；二、人才培养质量的决定者；三、优良学风的酿造者；四、学校声誉的建树者。他总结出我国大学校长关于教师理念的三种代表类型。一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灵魂”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二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三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三种教师理念，在我校

历史上治校者的心目中,也许均可引为知音。

自张之洞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开始,就注意延揽中外杰出人才。李瑞清本人才气纵横,诗书画俱佳,学问人品受人称道;思想开放,思路清晰,艰苦创业,崇实务本。为了提高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水平,他亲自到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延聘日本教习。江谦当南高校长时,礼聘郭秉文;郭秉文当校长时,重用陶行知和刘伯明,这些都显示出治校者用人的眼光和魄力。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在短期内崛起,与郭秉文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均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才大有关系。郭秉文延师有道,把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连总部都迁来南高师校园,一时俊彦云集,孔雀南飞。燕京大学校长、后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说南高师“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理工科有创建新型地学系,后来成为我国气象、地理学界一代宗师的竺可桢;有创建东大数学系,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教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熊庆来;有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系、“我国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秉志;有在扩充工科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世界著名科学家茅以升;有“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胡刚复,以及任鸿隽、叶企孙、吴有训等一大批科学家,造成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这种双峰并峙的局面。

建国以来,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仍是我校的传统,到20世纪末,为填补师资队伍的断层和适应新的办学目标的要求,我校的教师理念发生了重大变革。面向海内外延揽师资,尤其是杰出师资,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在全国首开延用文科特聘教授的风气。一时英秀咸集,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增强了学科综合实力。

我校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师德和师品,要求老师处理好学术研究、教学和育人的关系,把教学育人放在中心位置。在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改革等方面,各个时期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这种改革可以陶行知为代表。他力主改革“教授法”为“教学法”,给教学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采用“选科制”,通过了《改良课程案》。陶行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南高师和东大提供的特定环境分不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在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艰苦而卓越的探索,鲁洁、朱小蔓、竺佐领等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鲁洁从当代哲学和后现代教育哲学的高度,率先提出了社会转型期背景下“人的转型与教育”的重大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对培养“走向世界历史的人”的教育理念进行了独具创造性、超越性而有说服力的精辟的建构、分析和前瞻,为学校乃至中国教育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朱小蔓关于现代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走向及其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哲学探索;竺佐领关于现代师范精神以及高师教学改革的思考,都体现了我校办学理念上的新认知、新发展,并对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

治校、治教、治学的原则和方略,是办学理念的重要内容。

我校历史上业绩卓著的治校者,都很重视大学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从三江、南高、东大到南师院,都有完备的章程,而且都是在办学之初就已制定出来。这些章程一般都要遵从当时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但是也渗透进办学者的办学理念,体现出办学者的办学理想和管理思路。

以南高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下郭秉文的大学管理理念。

郭秉文正式接任校长之后,即于1919年10月4日聘请陶行知为教务主任,以接替自己原来的工作。10月22日,学监主任陈容辞职,郭秉文即改聘刘伯明继任。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等一批留美者开始对学校的组织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各位教职员的特点,分别组成各种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处理(各种事务)。这种委员会有常设功能,如:学校组织系统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办事方法研究委员会、校舍建设委员会、校景布置委员会;也有临时的,如暑期学校研究委员会、工读协助研究委员会、教课限度研究委员会、招收女生研究委员会、改良考试委员会、校内给水改良委员会、电灯改良委员会、制定校徽委员会、一览编制委员会、编制学历委员会、议事简则起草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校长在各委员会中聘任,主任则负责将各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报告校务会议核议或交校长分别执行……各委员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科学论证,民主决策。五四以后的南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与郭秉文校长的领导和全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一种组织制度,反映出一种管理理念。南高时期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思想,调动了教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制度改革以及“颇异部章”的学科结构调整,都获得成功。1920年南高的体制和机构基本定型。新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责任制”与“会议制”兼重的原则,既有民主集中,又有明确分工,发挥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方面的积极性;二是行政机构少、议事机构多,前者高效率,无冗员,后者多由教授兼职,既减少了编制,又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思想。

当代大学办学理念中,从全世界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仍是一个主要问题。东大当年有三会: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仿照英美的治校模式,具备了近现代大学的基本形态。行政权力如果与学术权力失去平衡,大学将出现动荡,郭秉文后

来卷入“易长风潮”之中,除了经济亏欠的原因之外,与他在两个权力之间的张力处置失当有关。

就教学管理的角度看,从南高到中央大学,都沿用1919年起采用的“学分制”,并且在不断改进。中央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学业考试上、教学要求上,都制定了较严格的制度,即使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仍能保持基本的教学质量。

南高在教学管理中,除了抓制度建设之外,还着手抓学风、校风建设,使师生处在一种健康的教学环境和风气之中。哲学教授刘伯明任学监主任,后任副校长,在倡导学风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论学风》、《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共和国民主精神》等。郑晓沧教授希望学生做绩学之士,养君子之风。南高教授既重士人气节,又尊重学术,教书育人,于“传授知识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一所高等学府形成了独具的精神和独特的学风,它的质量,它的发展,它的社会影响,便得到了保证。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不发达的国度里,要建造现代化的大学,必定耗资巨大。资金的筹措和投向是体现大学管理理念和发展理念的另一重要方面。

要实现办学理想,但资金不足,这几乎是大学办学者的永恒主题和永恒苦恼。郭秉文当校长时,不少精力花在学校的外交方面,内部管理由刘伯明负责。他在国家极为困难、学校经费也十分困顿的情况下,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兴建了东南大学科学馆,添置了仪器设备,据说这是国内第一座科学馆;图书馆在齐燮文的捐助下也兴建起来了。这种筹资力度和投资方式,与他“师资与设备平衡”的办学理念是吻合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的各届领导,冲破了解放初期受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而产生的理念定势,摆脱了计划经济所带来的思维惰性,跳出了极“左”政治观造成的思想藩篱,在发展理念、管理理念方面都远承前贤的思想传统,而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实现了新的超越。这种理念的超越,已经把我校从一个普通的省属师范院校,带进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行列,在中国高等教育舞台上,它有可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只要仔细翻阅收在本书第三编中的文章,我想读者会同意这一判断的。

(六)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就国际高等教育理念的变化谈一点认识。因为一个学校办学理念的生成,就目前的情况看,受国际理念的影响非常之大。要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三个面向”,就必须十分注意国际高等教育理念的特点。据专家研究,在一些国际性教育文件中,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国际高等教育理念的状况。这些文件为:

1993年10月25日至11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27届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资格的建议》;

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报告书《高等教育：从经验中学习教训》。该报告书在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出现的世界性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改革策略；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报告书《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这是紧接着世界银行报告书出版以后发表的一份有关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重要文献；

1996年，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书的有关高等教育部分，阐明了一些重要的高等教育理念；

1997年11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发表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等主要文献。

上述情况说明，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新态势的出现，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的旺盛期，新的理念不断涌现，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高等教育的针对性。“针对性”一词为英文 Relevance，中文也有译作“相关性”或“适切性”的。这个概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3个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当时教育整个体制以及每一所高校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所以“高等教育的针对性应以高等院校的作为是否符合社会的期望来衡量。”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应相协调、相适应。

——高等教育的质量观。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个核心概念。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其内容是：

(1)质量是一个包括高等教育所有主要职责与活动的多层次概念，它包括教学研究人员、课程与学生的质量以及其基础设施和学术环境的质量。

(2)从加强研究、国际合作、质量评价及教育大体系中各个系统的相互联系和衔接（如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系与衔接）等多方面着手，来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

(3)高等教育质量评优不应只想到财政问题，或者主要涉及高等院校的全面工作中那些适合于用数量来表示的质量指标。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法国就提出了教育国际化问题。但它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或新理念，一直未获得国际性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但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高等教育原来的三个核心概念“针对性、质量和效率”变为“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用“国际化”取代了“效率”，成为高等教育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并且被公认为高等教育的第一项基本职能。这项职能对于保证教育质量有重要意义。对于

进入 WTO 之后的中国,这个理念对于推进学校的事业发展意义更加重大。

——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以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全民化和终生化的要求。包括教育机构的多元化分流,经费来源的多样化渠道。主张通过多元化来加强针对性,通过私有化来强化效率性。认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是提高其针对性和质量的前提与基础。把多样化看成是发展知识及保护地方文化情况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如果毫无批判地套用外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对其学术和知识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历史证明,最有生命力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哪些能够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相互平衡的体制。”通过多样性,还能达到高等教育的灵活性,保证适应性。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社会良知、思想库的作用,发挥着批判、前瞻功能。高等教育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心或“主要组成部分”,大学被赋予如下四种社会职能:

- (1)培养学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 (2)提供适合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高度专业化的培训;
- (3)向全民开放,以满足最广义的终身教育各个方面的需要;
- (4)国际合作。

——高等教育的法人化趋势。“高等教育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传统理念被赋予新的内涵,提高教学人员的地位成为国际思潮。这是因为:“只有在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的气氛中才能充分享受教育、教学和研究的权利,而且公开交流研究成果、设想及意见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所在,并能有力地保证学术工作及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在考虑“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程度”时,不应当忽略“责任”问题。“考虑到财政投资巨大,会员国和高等教育机构应保证在高等教育机构享受的自治的程度与它们应有的责任这两者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关系。”

——高等教育的管理观。

(1)高等教育管理必须提高必要的规划和政策分析能力,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资源使用的成本效益,而且特别强调处理好高等院校与国家规划及协调机构之间的关系。

(2)高等院校应采用能满足周围环境需要向前看的管理方法。

(3)高等院校应拥有管理其内部事务的自主权,但同时必须有明确和透明的责任制,以便向政府、社会、学生和整个社会负责。

(4)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对全球性问题的了解与高效率的管理技能相结合的管理方法视为己任。与此相关,要体现出应有的平等、公平和民主精神,促进研究与教学的互动,加强教师和学生的对话。

——高等教育投入的新视野。以往把多方募集资金作为解决经济短缺的方法,现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体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并应进一步